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汉学研究

第四集

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 主编



中華書局

K207.8
Y085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汉学研究

第四集

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 主编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研究 第四集/阎纯德主编 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1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ISBN 7-101-02568-4

I. 汉… II. 阎… III. 汉学—研究—文集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1097 号

《汉学研究》第四集

阎纯德主编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政编码 100073)

电话 (010) 63458235

北京昌平奔腾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 18.875 字数:610 千字

ISBN 7-101-02568-4 定价:30 元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编辑委员会

- 顾 问 任继愈 (Ren Jiyu)
张岱年 (Zhang Dainian)
季羨林 (Ji Xianlin)
杨庆华 (Yang Qinghua)
汤一介 (Tang Yijie)
李学勤 (Li Xueqin)
曲德林 (Qu Delin)
安平秋 (An Pingqiu)
- 主 编 阎纯德 (Yan Chunde)
编 委 乐黛云 (Yue Daiyun)
王 丽 (Wang li)
李明滨 (Li Mingbin)
严绍瑗 (Yan Shaotang)
杨翠微 (Yang Cuiwei)
侯 健 (Hou Jian)
耿 昇 (Geng Sheng)
柴剑虹 (Chai Jianhong)
钱林森 (Qian Linsen)
黄卓越 (Huang Zhuoyue)
阎纯德 (Yan Chunde)
韩经太 (Han Jingtai)

卷前絮语

《汉学研究》第四集很幸运，因为它终于没有像太阳下山时留给大地的影子那样越拖越长。在它于 2000 年之春举着鲜花面世的时候，我们的脚步才又接上第一二三集的“传统”。

像我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这样的学校，虽然数十年积淀下来的精华“传统”是对外汉语教学，但是这个充满中国人文精神的学科，浑身上下语言和文化，交汇成东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一个狂欢之海。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汉学逐渐自我发展成一个新的学科。我们大学伸出两只手，一面是国学，一面是汉学，我们尝试着描绘新世纪的蓝图。我们这个没有牌子的汉学研究所，没有大师，没有专家，没有吹牛，没有取巧，只有不声不响地在这个世纪潮流之中学习弄潮。

学术的事业是艰辛的，也是幸福的。

学术需要支持。我们感谢学校给予的经济支持和精神鼓励。

我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愿意同中外学者一起，为了共同的文化事业，为了 21 世纪的文明结伴前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编辑委员会
2000 年 1 月 11 日

迎接汉学研究的新发展(代序)

乐黛云

自经济、科技全球化时代提出文化多元化问题以来,如何推进不同文化间的宽容和理解成为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以“互为主观”、“互为语境”、“互相参照”、“互相照亮”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理论逐渐为广大理论界所接受,并为多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最适合的“他者”,日益为广大理论家所关注。正如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所说:“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①他还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是《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和著名哲学家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写成的三本书陆续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本《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通过当代哲学的新观念对孔子思想进行再思考;第二本《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强调西方思维方式重在超越、秩序和永久性,中国思维方式重在实用、模糊和变化;第三本《从汉而思: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则集中讨论了自我、真理和超越的问题。2000年刚刚出版的斯蒂芬·尼克曼(Stephen Shankman)所写的《赛琳^②和圣

贤：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知识与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对希腊和中国的认知方式作了互有回应的双向阐释。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大都不再用主客二分的方式把中国和西方作为独立于主体的固定对象来进行分析,而是如弗朗索瓦·于连所说:“我不认为能够把书页一分为二: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希腊……因为意义的谋略只有从内部在与个体逻辑想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被理解”。^③也就是说,中国或西方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根据“个体”(主体)的不同理解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因此,理解的过程也就是重新建构的过程。这一理论的新发展为西方的汉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过去,传统汉学研究大部分只是单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介绍,往往处于学术界的边沿,很难直接对西方主流文化发生影响;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往往需要通过并非汉学家的主流学者如伏尔泰、歌德、莱布尼兹、容格等方能实现;二次大战后新起的“中国研究”也是将中国作为一个特定对象,单方面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研究,寻找对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以上所谈的、新起的汉学与传统汉学和“中国研究”都不同,它强调在参照中回归对自己的认识,既重新建构自己,又重新建构对方,是西方反省和重新认识自己,使自身文化获得更新的重要途径。新的汉学研究不只是介绍,而是直接进入双方文化对话和重建的主流。

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不仅为西方汉学带来了突出的变化,同时也为西方非汉学的理论界带来了新的气象。过去,主流文化的代表如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虽也曾提到过非西方文化,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非西方文化只是一种陪衬,往往是处于“未入流”的地位。如今情况不同了。一些非汉学家的理论家开始用以上“互为语境”的方式,以一种“非中心论”的心态,来探讨西方和非西方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新的理论。美国很有影响的理论家弗·杰姆逊多次访问中国,并在北大开设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④课程,他虽不懂中文,却借助翻译大量阅读了鲁迅、老舍等人的作品,观看了大量中国

电影,并将他的心得汇入了他的理论。他在90年代出版的新著《地理政治美学:世界体系中的电影和空间》(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就是从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角度来讨论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电影叙述的功能和意义冲突的。欧洲的杰出理论家翁贝尔托·埃科(Umberto Eco)1995年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差异”;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寻找西方的“独角兽”(Unicorn),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他在1999年波罗尼亚大学建校90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特别强调:“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范围之中”。^⑤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中心论的基石。

这些理论的新发展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向。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虽然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但过去多局限在以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对非西方文化则往往采取征服或蔑视的态度。自全球化时代提出文化多元化问题以来,这一情况有了极大改变,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迅速突破了封闭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相互参照的范围。这种急速变化不能不使一些对非西方文化不重视、不理解、也无准备的西方学者感到困惑,甚至使一些仅局限于西方文化体系的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机构陷于停顿,引起一片比较文学危机的惊呼。其实,这只是就封闭的、以欧洲中心论为核心的旧式比较文学而言,如果将新兴的比较文学定义为跨文化文学研究,那么,这种比较文学显然正在全世界勃兴。一些敏感的比较文学家早已看到这一点并将其研究方向转向异质文化研究。如两次连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美国著名学者厄尔·迈纳最新的名作《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就是以东西方诗学互为语境的研究为核心的;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编的九卷本《世界比较文学史》原来只包含欧美文化而号称“世界”,现在不仅加进了《东亚比较文学史》一卷,而且在现代、后现代的一卷中加进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地区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容。

总之,由于文化转型,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原来互不相干的三个学术圈子:汉学研究、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正在迅速靠拢,并实现互补、互识、互证。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当代国际汉学必将得到空前的发展,为21世纪文化的重建作出重大贡献。

附注:

①③《迂回与进入》(Le Detour et L'Acces, Strategies du Sens en Chine, en Grece) 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著,杜小真译,三联书店,北京,1998。

② 赛琳:希腊神话中人面鸟身的女神,智慧的象征。

④ 讲义修订本见《北大学术讲演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⑤ 译文见《跨文化对话》第四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

目 录

迎接汉学研究的新发展(代序)	乐黛云 (1)
我看汉学和汉学研究	阎纯德 (1)
美国的汉学研究	熊文华 (7)
妖魔化的镜像——19世纪美国作家对中国的误读	冒 键 (46)
俄国汉学史提纲	李明滨 (56)
索罗金和他的元曲论	李明滨 (66)
帝俄时期:从汉学到中国文学研究	理 然 (76)
阿列克谢耶夫与俄国汉学	阎国栋 (110)
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生平与著作	阎国栋编译(131)
记俄国汉学家阿·瓦·鲁达科夫——纪念远东国立大学 成立100周年	金志刚 [俄国]谢尔盖·Y·付乐吉(155)
俄罗斯远东地区汉学研究综述	
——国立远东大学的汉学教学与研究	金志刚(161)
西方的中国神话研究	周发祥(170)
越南的儒学研究	陈 清(183)
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	张西平(190)
斯坦因与敦煌文物的流散	刘进宝(213)
意大利入华画家年修士事迹钩沉	耿 昇(231)
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	李志军(239)
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的结合	李志军(251)
论中法文学交融的历史特征	钱林森(260)
二战后的法国汉学	许光华(284)

- 鸦片战争前的法国汉学与中法文化交流…… 田永秀 鲜于浩(308)
- 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 17—18 世纪的
海上丝绸之路 …………… 耿 昇(321)
- 二世纪到七世纪的道教和民间宗教
…………… [法国]石泰安 王宗昱译(345)
- 北京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的历史变迁…………… 余三乐(370)
- 鸦片战争前在湖北传教的法国籍耶稣会士…………… 康志杰(385)
- 《耶稣会教士自中国被逐记》与异文化误读
——伏尔泰的误读及意义…………… 叶 潇(395)
- 老子在法国…………… 杜青钢(405)
- 高地亚洲元代历史地名的沿革 ……………
…………… [法国]韩百诗著 耿 昇译(415)
- 论王则领导的弥勒教秘密会的起义
…………… [俄国]斯莫林著 岳 岩译(441)
- 绿蒂笔下的中国形象…………… 钱林森(463)
- 杜牧文学思想探源…………… [韩国]金昌庆(469)
- 朝鲜许兰雪轩诗在中国的流传…………… 祁庆富 杨 玉(480)
- 古朝鲜汉文诗的奇葩…………… 李贞爱 李 炬(499)
- 元杂剧的主题类型和人物刻画
——时钟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述要…………… 周发祥(508)
- 话本与《十日谈》和《萨瓦·格鲁岑》…………… 理 然(518)
- 语义对应:六朝志怪小说的叙事结构 …………… 理 然(528)
- 越南汉文辞赋述略…………… 王晓平(538)
- 日本汉文辞赋述略…………… 王晓平(550)
- 再论苏轼诗学的“反常合道”…………… [韩国]安熙珍(563)
- 试论老舍作品中的女性描写…………… [德国]凯茜著 马树德译(574)
- 岁时、风俗与诗 …………… [日本]中岛敏夫著 徐 江译(586)

我看汉学和汉学研究

阎纯德

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用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话说：“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是的，中国文化从未断流，它一直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去，带着中国文化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于是就有了“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所以，可以说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①汉学是人类文化的一门专学。

汉学从萌芽，到发展和成熟，已经有相当长久的历史。它的真正建立，应当归功于始于十五六世纪大批入华的耶稣会士。从那时开始，西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于是将中国文化作为介绍和研究对象的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俄国等国家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在日后的几个世纪里，西方文明依仗科技、工业、商业之优势，以不文明的方式压制东方文明，致使东西之间，长期处于不和状态，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写满了宗教怀柔和炮火相加，“交流”伴随着掠夺，但是这个不平等的“交流”却旁生了一对文化双生儿：“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这一双不平等的文化孪生儿的成长过程创造出了汉学。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西方知识分子认识、研究、理解、接受中国文明的历史。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汉学

的发生和兴盛发达。西学东渐的同时,也为中学西传开通了道路,架起了桥梁,为汉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欧洲为先驱,汉学是在西方一代代汉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传统的。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尤其是近代,中国也有伴随着它的发展,政治上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汉学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续。但是,它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就是说,汉学对我们中国文化具有了镜子的作用、借鉴的意义。

现在谈论什么是汉学的问题似乎可笑。事实上,何为汉学,是需要明确或澄清的。时至今日,国内几家汉学研究所以及所出版的书刊,所指的都不是汉代以降文人在经学研究方面以重名物、训诂、考据为主的那种“汉学”,皆系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方面的学问所说的“汉学”。前者延续至今的,很像现在人们所说的“国学”,这可以从北京出版的《国学研究》和台北出版的《汉学研究》得到证实。但是,现在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汉学”从原来的(国内汉学)认识上剥离下来,这有利于汉学研究的规范化。李学勤教授在《国际汉学漫步》序言里说:“‘汉学’,英语是 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 SINOLOGY 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译词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较为方便。”还说“‘汉学’的‘汉’是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中国,就像 SINOLOGY 的词根 SINO 来源于‘秦’,不是指一代一族……”^②我很赞同这个几世纪以来,外国学者和中国多数学者共同构成的共识,或者说是一种成熟的约定俗成。但是为了同“国内汉学”相区别,学术界还是有了“国际汉学”、“海外汉学”的说法。以我的看法,最好是把“国际汉学”、“海外汉学”统称为“汉学”,“国内汉学”称为“国学”。当然,大家可以采用不同的叫法,各行其是也未尝不可。关于“汉学”和“中国学”,“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从传统上讲是有区别的,前者更传统,更

富有欧洲之人文精神,偏重于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介绍,而后者则多一些现代性,多一些包容性,更偏重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和考察。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不管是“汉学”,或是“中国学”,它们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致的,其研究和考察对象是一个从古至今的整体中国及其历史文化。

什么是汉学研究?汉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汉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再研究。这种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近于空白。清朝末年,王国维算是较早对汉学有着深刻认识的中国学者,在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并翻译了他的《近代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结论》后,认为伯希和的看法“优于中学”。但是,这样的学者在当时实在太少。戊戌变法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虽然也有人介绍和研究西方汉学,但是毕竟还是寥寥,系统的汉学研究更是少见。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年代里,中国的先觉者,所关心的是中国的生存和自救,看重的是西方的科学和船坚炮利,而对自己文化里派生出来的汉学无暇给予太多的关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先驱们,看重的是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批判和对西方文化思潮的移植和吸纳,对汉学研究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说到汉学研究,倒是日本人先走了一步。比较早的,有日本的石田干之助的《中欧人的中国研究》(1932年出版)和《欧美的中国研究》(1942年出版),以及后藤文雄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学起源》(1933年出版)。直到1949年,中国学者莫东寅才出版了汉学研究专著《汉学发达史》(文化出版社)。这部汉学研究著作虽然比较简单,但其意义深远,因为我们毕竟有了第一部汉学研究著作。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30年的闭关锁国,中国人几乎不谈汉学。而学界自发地较多地关心汉学和开始研究汉学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当然是改革开放给汉学研究带来的契机,经过20年的发展,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不仅汉学已被学界普遍关注,而且专学、显学的色彩越来越浓,在它的大门前来攘往地已经聚集了一群仁人志士。

按照李学勤教授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以来的汉学研

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孙越主编）《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等，以及《海外研究中国丛书》、《海外汉学丛书》等就是代表。第二阶段是90年代，其标志是汉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汉学专门刊物的出现。自1991年四川外国语学院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所之后，在北京相继出现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及中华书局的汉学编辑室等，先后出版了《国际汉学》、《法国汉学》《汉学研究》和《世界汉学》等书刊。第三个阶段，是当下正在进行和正在发生的汉学研究的深入和成熟^③。“把各国汉学和汉学家置于学术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既要有个案研究，又要有综合研究。”^④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源”，显而易见，汉学就是“流”。当然，这个“流”也是相当浩瀚的。时至今日，我们能看到的翻译过来的汉学著作还非常少，甚至一些非常重要的汉学著作也还没有译成中文。就是说，等待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另外，虽说汉学这块他山之石是蕴藏着不少真知灼见，但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误解也随处可见，这也需要我们认真读书、思考、比较、梳理、研究。《列国汉学史》和《世界汉学史》还没有问世，以理念从中外文化比较学的角度对汉学进行深刻理论研究的著作也还没有。这就是当下我们这支队伍分散而不整齐、奇缺经费的汉学研究界所面临和正在从事的艰巨任务。

汉学的发生、发展和繁荣是点点滴滴、不知不觉的酝酿过程，它是漫长历史的智慧浸润出的花朵。

西方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与目的是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却共同滋润了汉学的发生和发展。汉学从盲目到自觉，从好奇猎奇到政治到学术，是西方深入认识中国和东西方“磨合”的一个历史过程。在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史上，汉学的现代性表现为弱肉强食般的掠夺，近代史上汉学的成功积累是以中国的屈辱和痛苦为代价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有案可查或无案可考的中国文化典籍的惨痛被盗和“流失”是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的，它们至今堂而皇之地陈列或不见“地躺在异国的文化场所或私人家中的阴暗角落；到了20世纪二

三十年代之后,由于世界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尖锐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汉学”成为政治的一个部分。本来汉学应该是从纯学术的襁褓中诞生的,但是学术却遭到了政治的强暴。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两大集团的政治意识相对淡化,就汉学而言,随之而来的是学术意识的逐渐增强。

人类至今并没有摆脱战争的威胁。真正的文明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是21世纪,将给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机遇。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高速公路,不会把我们引到文化全球化的胡同里。文化交流,文化互补,始终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基本程序。这个程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就是说,高科技虽然影响文化的发展,但它不会使之变为一体化。所以,中国文化将会永久地存在下去,汉学和汉学研究也将永远存在和永远进行下去。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学习汉学语言文化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各国学者在人类新的历史时期,倍加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借助信息网络,中学外传便得以加大加快,所以各国还会产生更多的汉学家,汉学不但不会停滞,还一定会有新的发展,汉学研究也会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全球化”被认为是当今最重要的时代特征。由于人类经济上出现了一个并不完整的“全球化”联网,于是文化人便创造了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梦想。人们不断强调文化认同,强调“我们是谁”,而不是“我是谁”的问题。美国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90年代世界冷战后,爆发了认同危机,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事实上,每个人首先属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然后才属于世界。亨廷顿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对抗行将转化为文化认同差异的对抗。似乎我们不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它确实也是与汉学和汉学研究有关联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个“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一条绿色通道,自然它会给文化带来巨大影响。但是人类文化只能认同一种文化吗?文化能够“全球化”吗?“全球化”是一元化吗?若是一元,是否就是美国化?我深信文化永远都是多元的,虽然在网络上国家失去了国界,城市拆除了城墙,但是多数民族的文化都不会因此失

掉传统,尤其像中国,中国文化的“中华性”其根基是不会动摇的。现在我们所预测的未来,是在没有硝烟的蓝天下进行的浪漫操作,事实上战争是可以粉碎任何美丽理想的。但是,不论世界怎样发生变故,中国文化不会消亡,汉学不会消亡,汉学研究不会消亡。当然,如果人类能在 21 世纪长期和平相处,东西文化就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彼此接近彼此认识,甚至可以互补兼容优长。

历史发展到 21 世纪,东西文化毕竟互相接近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比如交通、印刷出版、电信、信息网络等,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为汉学的发展和汉学研究的进行带来了便捷和好处。中国文化不再是囚禁在人类博物馆里的化石,而是逐渐把民族意识和当代意识结为一体的全新文化。

人类走到今天,各种文化是在斗争、排斥、拥抱、联姻、兼容的过程里发生、发展、没落和消亡的。文化借助于经济、政治的力量在变中求生存求发展,变则生,不变则亡。自然界存在竞争,社会存在竞争,文化也存在竞争;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生存竞争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但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其生存发展中,都必须破除自己的“中心主义”,不断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精华,逐步自我完善,然后才能进步。

汉学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借鉴。汉学研究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21 世纪的新汉学,会包蕴更多的当代意识特征,而有别于 20 世纪以前的旧汉学。21 世纪的汉学研究,也一定会有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

附注:

- ① 阎纯德:《汉学研究·序》,第一集,1986 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 ②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1997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 ③④ 李学勤:《汉学研究·序》,第三集,1999 年,中国和平出版社。